

## 壹、前言

本文旨在論述全球化體系對國家角色屬性的牽引作用，並以英國的教改路線進行實徵性研究。此種實徵性研究須著重於研究發現的呈現與剖析，所以無法大篇幅進行廣泛的文獻分析，只能擇取較為重要的國家理論，以凸顯出全球化與國家角色的關聯性。基於上述考量，本文選取A. Gramsci, M. Foucault及C. Offe三人的論點進行剖析。選擇這三人的主要考量，不僅其理論的重要性，而且前兩人偏向工具論的思維，與C. Offe的論點具有對比性。

關於國家角色，Gramsci (1971) 的文化霸權理論或是Foucault (王德威譯, 1993;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a, 1992b; Foucault, 1990) 的後結構論點，皆指向國家藉由教化途徑，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然而這些論點將國家貶抑為增生資本利益的道具，因而低估國家的自主性。相反的，Offe (1985a, 1985b, 1996) 認為國家政策往往以擴張經濟規模的手段以使更多社會成員受益，此種取向足以開啓更大的經濟平臺，所以資本利益僅是共同利益的衍生物，而非主導國家政策的關鍵因素，因此國家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動作為。

儘管上述論點基於不同假定，來剖析國家機器的角色，但是這仍可能存在預設立場的缺失，亦即尋求足夠的證據以求證預設立場。因應此種可能的缺失，Lukács (1971) 的建議是，在真實社會情境檢視理論的價值與意義。所以國家機器的運作可能並非純然受制於特定的社會階級，亦可能不是基於本身公正職能，而可能是充分反映所處社會情境的產物，例如教育走向往往反映外在環境的特性與需求 (姜添輝, 1999, 2002)。當前全球化經濟體系已跨越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障礙，並迫使追求經濟利益的許多國家調整自身以契合此種體系的特性與需求 (姜添輝譯, 2005; Chiang, 2011; Heywood, 2003; Schriewer, 2003)。就此而言，國家政策可能並非只是優勢

階級增生自我利益的道具，亦非具有高度的主動性，而可能是因應外部經濟體系的屬性與要求，進行自我調整的機器。本研究將以1997~2007年，英國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政府的中、小學教育改革（下稱教改）政策作為研究對象，以釐清全球化經濟體系與國家角色的關聯性。

## 貳、文獻回顧

### 一、A.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

Gramsci（1971）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指向，社會信念是驅動個體行動的基礎，因此統治的技術是主導社會信念，以塑造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而文化具有政治特性，所以統治階級必須持續運作在社會信念的主導權：

如果統治階級失去其意見的一致性，例如不再有領導，而僅是支配與運作脅迫力量；此種精確的意思是廣大社會大眾已經變成脫離他們的傳統意識型態，且不再相信他們先前習慣相信的。此種危機的精確組成是舊有的逐漸死亡，而新的卻不能誕生；在此種國家無正常統治者的時期中將出現病態徵狀的一個巨大分歧。（Gramsci, 1971: 275）

此種主導權是運作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將統治團體的價值觀轉化成社會的主流意識，以塑造社會大眾的信念，進而使他們聽從於支配階級的領導與指揮：

形成新知識份子主義並且決定新觀念，由於此種概念符應隱藏的渴望，並且順應到生活真正形式的發展……新知識份子……活躍的參與實際生活，他們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演說家，亦等同於建構者、組織者